

Reinvestigating Zhang Taiyan's "Dongfang Gezhi" Exposition: A Discussion on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Thinking in Modern China

Di CHENG

Abstract: "Dongfang Gezhi" Exposition constructed by Zhang Taiyan derived from "Western learning from Chinese origin" theory, whose ambition was to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 of modern Western science and to communicate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Zhang once tried to take arithmetic and geometry as the common foci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which has touched the a priori nature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n the same line with Zhang's idealistic comprehension to "Gewu Zhizhi" and Xunzi, and thus represented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thinking in modern China, and transcended "Western learning from Chinese origin" theory to some extent. However, in the serial articles named "Dongfang Gezhi", Zhang failed to insist upon proving the tacit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with the universal understanding subject, but returned to the cultural narcissism discourses of "Western learning from Chinese origin" theory that inordinately attach Chinese and Western knowledge, which was not only due to the lack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severe national crisis in that era, but also because the endogenous value of Chinese culture could not be explained by natural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thinking alone. The failure of "Dongfang Gezhi" Exposition constituted a starting point of a problématique, from which Zhang defined "Guocui" concept in a specialization perspective, and its demand of establishing an understanding subject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Zhang's "Qiwu" philosophy by means of the concept of *parikalpita-svabhāvāh*, which deeply influence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Keywords: Zhang Taiyan, Dongfang Gezhi, Western learning from Chinese origin, the understanding thinking

Author: Cheng Di received his PhD in Chinese history at Fudan University in 2022 and is currently an editor at Historical Research Magazine, Chinese Academy of History. His research centers arou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especially Zhang Taiyan's academics, and he has published a few articles in *Chinese Studies* (Taipei) and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章太炎東方格致論再探

——兼及近代中國的知性思維自覺

成棣

[摘要] 章太炎早年建構的東方格致論承西學中源論而起，以因應西方近代科學挑戰、會通中西學術為理想。其間章太炎一度嘗試專以算理為中西會通之焦點，此舉有見於數學知識的先驗性質，亦與太炎歸本致知、攝所歸能的格物致知論及荀學立場相通，表徵著近代中國知性思維的自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學中源論。但在「東方格致」中，章太炎沒能堅持以普遍知性主體證成中西冥契，而是退回西學中源論肆意附會中西知識的文化自戀話語，這與當時科學知識過於貧乏、救亡壓力過於沉重有關，更是因為單憑自然科學知識與知性思維無法闡釋中國文化的內生性價值。東方格致論的失敗構成章太炎由別異性視角界定國粹概念的問題意識起點，而此論提出的安立知性主體訴求，則憑藉遍計所執自性概念貫徹於章氏齊物哲學的理論構造，對20世紀中國思想史影響深遠。

[關鍵詞] 章太炎 東方格致 西學中源 知性思維

[作者簡介] 成棣，1992年8月生，北京人。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2022），現為中國歷史研究院歷史研究雜誌社編輯。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研究、章太炎思想研究，有論文發表於『漢學研究』（臺北）、『史學月刊』等刊物。

一 引言

近代中西相遇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使得中國政教的現代轉型成為貫徹於中國近代史各個方面的核心問題。思想學術領域也絕非例外。其間佔據顯著地位的章太炎（1869～1936），雖以國粹或國故等思想標籤見稱於世，實則其學“本以參合新舊起家”，^①得力於19世紀下半葉湧入國門的西學知識甚深。學界多將章太炎視作中國現代學術建立或中國思想現代轉換之樞紐人物，^②良有以也。

以1900年為界，早年章太炎的西學閱讀史可大致分為兩段。前段對象係廣學會、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等機構的出版物，內容為傳教士譯介的自然科學知識，後段對象則係日人論著及日本學界譯介的西方著作，內容轉向社會政治方面。章太炎對歐美及日本社會學、哲學、心理學等知識的吸收，在重訂本『煇書』中多有反映。^③而研討自然科學知識的心得，具見於『膏蘭室札記』第248、338、346、411～425、427～433、462則；1899年，章太炎又從中擷取若干條目加以刪削，以「東方格致」為總標題，發表在『臺灣日日新報』。這批文獻旨趣皆在以漢學考據方式從東方古籍中詮釋出近代科學（亦即“格致”之學）觀點，對於此類牽合中國舊學與西學新知的觀點與論述，無妨借章太炎本人改定後的札記總題，謚之曰東方格致論，這便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

圍繞章太炎的西學閱讀，學界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且不提章太炎1900年後對西方社會政治理論、哲學觀念以及明治日本思想的援引，^④單論戊戌前後的自然科學認知，唐文權、羅福惠、姜義華、熊月之、彭春凌、蔣功成、何剛剛、黃嘉慶等人也從不同視角進行過考察。^⑤即便如此，此項議題仍不無繼續探索的空間。首先，一些文獻方面的基礎性問題，如『札記』有關西學條目的具體寫作時間、諸條目內部學術取向的分歧，以及「東方格致」對『札記』的改寫等，仍存在未發之覆。其次，東方格致論與19世紀下半葉風靡思想界的西學中源論關聯至密，澄清此一背景，於更深刻地理解東方格致論的問題意識和對前輩論者的繼承與超越，亦當不無小補。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在章太炎畢生學術系統內，東方格致論只是被棄置的半成品，但正是此類早年碰壁經歷，恰可窮源竟流地揭示其人學術性格的形成史。更何況東方格致論正是章太炎直面近代以來中國學術最強大的挑戰者——近代科學，及其背後矗立的知性思維的戰場。在17至19世紀近代西方哲學語境下，知性指的是主體綜合對外間世界的感性經驗、形成普遍有效知識的認識能力，亦即近代自然科學真理性之形而上學依據。^⑥中國傳統義理之學素有德性之知、聞見之知之二分，聞見之知與近代西方哲學之知性指向相近，但在德性之知的強勢主導下，其發達程度遠遜西哲。延續自身脈絡開拓量論，厥為近代中國學術在西潮刺激下面臨的一項重大課題。對涵泳於東方格致論的知性思維因應問題再作發微，不但有助於究明章太炎個體學術生命變遷之動因，更可為從知識系統與

① 參見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 積微翁詩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80頁。

② 參見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導言」與張志強『朱陸—孔佛—現代思想——佛學與晚明以來中國思想的現代轉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第五章的相關論述。

③ 關於章太炎的西學閱讀狀況，特別是『煇書』重訂本呈現的社會科學轉向，較為早出且全面的評述，參見姜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164～168頁；『章炳麟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第348～350頁。

④ 除前引姜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章炳麟評傳』外，彭春凌『章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研究、重譯及校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上編也對章太炎譯介斯賓塞社會學著作引發的中、英、日跨語際思想連鎖作出過深刻分析。至於章太炎與明治日本思想界的互動，日本學者小林武已有專書『章太炎與明治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白雨田譯）論列。

⑤ 參見唐文權、羅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第28～47頁；姜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第三章，第92～102頁；熊月之：『早年章太炎與西方格致之學』，『海派映照下的江南人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第32～44頁；蔣功成：『章炳麟與西方遺傳學說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自然辯證法研究』8（2009）：86-90；彭春凌：『章太炎儒術新詮中的近代學術嬗變』，『中華文史論叢』2（2018）：295-348、405；何剛剛：『從『膏蘭室札記』看章太炎“以西釋子”的詮釋特點及其當代啟示』，『長沙理工大學學報』2（2022）：73-79；黃嘉慶：『章太炎早期札記中的“西學”問題』，『現代中文學刊』2（2022）：60-65。黃嘉慶的論文比較全面地梳理了『膏蘭室札記』涉西學條目，對章氏西學知識定性而非定量等特質的觀察尤其細緻入微，具有啟發性。

⑥ 在20世紀以降的現代西方哲學特別是現代科學哲學看來，近代認識論賴以成立的主客二元分立觀念，以及對科學思維的理性主義解釋皆大有可商。不過，本文核心意圖是對東方格致論進行思想史考察。考慮到機械自然觀、經驗論與唯理論的爭辯等，皆屬影響19世紀末中國知識界的主要西方思潮，故仍取近代西哲觀念為出發點，而暫不涉及現代西哲關於人類認知能力的複雜討論，及其與近代中國思想在純粹理論維度上的雙向“格義”。

思維方式角度觀察近代中國思想轉型歷程提供一個有價值的參考案例。

二 章太炎與西學中源論者的思想交集

正如論者所指出，『膏蘭室札記』回應西學知識的常見做法，是以漢學訓詁方法證明近代西方科學早為東方古籍所包蘊。如『札記』第432則僅憑『管子·五行』所記黃帝五鍾名號與聲學、重學、光學、電學、化學等學科名目偶合，便斷言“古聖人”早已掌握近代科學的“一切奇詭非常之術”，帶有鮮明的附會特徵。^①而這種根據字面意思認定中國舊學與西方科學相符，且為後者遠祖的觀點，正是典型的西學中源論。

從較長時期來看，西學中源論至少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在華活動。但它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回應，並形成籠罩性的知識氛圍，尚需等到西方知識更大規模湧入國門的19世紀下半葉，這一時段完整地涵蓋了章太炎對各類知識充滿渴求的青年時期。許多西學中源論者都曾成為早年章太炎閱讀甚至對話的對象。例如著有『論西法皆古所有』的廣東南海人鄒伯奇（字特夫，1819~1869），此人與番禺陳澧（1810~1882）相交甚契，後者為鄒氏『學計一得』作序，於其“墨子書有算術，且有西法”之發現歎賞不置，^②且在『東塾讀書記』中對這種西學墨源論大加摘引並予以發揮；而陳澧及其『東塾讀書記』極受章太炎關注。^③1909年章太炎陳述他的墨學研究心得時提到：“鄒特夫曾以形學、力學比傅，誠多精義，然『墨經』本為名家之說，意不在明算也。”^④是則彼時太炎學術雖已另有進境，卻仍不諱言早年從鄒伯奇受到的啟發。類似的西學墨源論也屢見於黃遵憲（1848~1905）所著『日本國志·學術志』。^⑤該書在甲午後對思想界觸動甚大，只消一瞥章太炎1897年所作「讀『日本國志』」，即可窺見黃著給投身維新運動之際的章太炎帶來的巨大震撼。^⑥

與鄒伯奇、黃遵憲相比，薛福成（1838~1894）的西學中源論所引中學資源尤為龐雜炫目。除墨學一端外，薛福成還認為『呂氏春秋』及『淮南子』有電學、化學知識，西方代議制、專業分工及實用學科發達，乃至開設公司、殖產興業皆有得於『管子』餘意，『莊子』也早已預言了近代西方科學的諸多發現。^⑦比照這些觀點與『膏蘭室札記』有關係目，不難感到章太炎以物理、化學知識解說『淮南子』、以算術疏通惠施歷物，^⑧及謂『管子』為“泰西商務所自出”，^⑨都很像薛福成種種議論的延續；如果留意到章太炎1899年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的兩篇文章分別援引過薛福成對東南亞政俗的描摹與移民澳洲之議，^⑩便可知二人西學中源論的近似殆非偶合。

章太炎平生最重要的論敵康有為（1858~1927）講學萬木草堂期間屢屢道及西學西教源出孔、墨諸子，^⑪尤好言墨子與耶穌的相似，^⑫這當然是建立孔教抱負的投射。章太炎對“康黨諸大

① 『膏蘭室札記』，『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229頁。另可參見黃嘉慶：「章太炎早期札記中的“西學”問題」，《現代中文學刊》2（2022）：60-61。

② 陳澧：『東塾讀書記』（外一種）（上海：中西書局，2012），楊志剛編校，第273頁。

③ 1898年章太炎撰寫「『正學報』例言」，曾舉陳澧『漢儒通義』為立言典範（參見『太炎文錄補編』（上），『章太炎全集』（十），第57頁）。進入20世紀以後，章太炎對陳澧的評價屢有起伏，此處不遑備論，但他篤信『國故論衡』價值“較陳蘭甫『東塾讀書記』過之十倍”（1915年12月23日致龔寶銓書，『書信集』（下），『章太炎全集』（十三），第755頁）的自白，也未嘗不可從反面揭示中年以前的章太炎實以陳澧『東塾讀書記』為其著書立說的摹擬與爭勝對象。

④ 章太炎：「致國粹學報社書」。此信原刊『國粹學報』己酉年第11號，引文據『書信集』（上），『章太炎全集』（十二），第329頁。

⑤ 黃遵憲將西方的天賦人權論、基督教觀念與科學分別對應於墨學的尚同論、兼愛尊天明鬼諸論與『墨經』，以證明“泰西之學，其源蓋出於墨子”。參見黃遵憲：『日本國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吳振清、徐勇、王家祥點校整理，第777~779頁。

⑥ 『章太炎全集』（十），第46~48頁。此文原刊於『譯書公會報』1897-11-15。

⑦ 參見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上海：中西書局，2012），王立誠編校，第272~274頁。

⑧ 參見『膏蘭室札記』第412、415、417、418、422、424則。

⑨ 參見章太炎：「讀『管子』書後」，『章太炎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朱維錚、姜義華編注，第20頁。另參『虜書』初刻本「喻修靡」。

⑩ 章太炎：「刻包氏『齊民四術』第二十五卷序」，『臺灣日日新報』1899-01-11；「究移植論」，『臺灣日日新報』1899-04-02。

⑪ 參見康有為：『長興學記 桂學答問 萬木草堂口說』（北京：中華書局，1988），樓宇烈整理，第72、118、191、180、204頁。

⑫ 參見康有為：『長興學記 桂學答問 萬木草堂口說』，樓宇烈整理，第175、179頁。

賢，以長素為教皇”的做派深惡痛絕，以致於1897年4月被逐出時務報館；^①但稍顯吊詭的是，幾乎與此同時，他本人也在鼓吹以墨家尊奉巨子的方式選立“三老五更”，對標天主教與藏傳佛教的宗教首領，振興孔教。^②這不僅反映出章太炎在與康有為孔教論搏鬥時亦曾受其影響，^③也揭示出太炎孔教觀念及客帝論在思想背景方面與西學中源論的關聯。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仁俊（1866～1914）。他所著『格致古微』依照四部分類次序，譜列從183種中國古書中“發現”的數百條科學知識，堪稱戊戌前夕西學中源論的總結性著作。無怪乎直到西學中源論已成明日黃花的五四時代，此書仍然作為代表“老維新黨”荒謬守舊的時代標籤，被陳獨秀（1879～1942）在『新青年』上點名奚落。^④然而學界似乎較少留意章太炎與王仁俊的交往。1897年8月『實學報』創刊，章太炎為總撰述，而該報總理正是王仁俊。次年春天，章太炎赴武昌助張之洞（1837～1909）辦『正學報』，又與王仁俊同事。與章太炎有金蘭之交的章士釗（1881～1973）晚年回憶也提到太炎“與王仁俊至稔”。^⑤就在1896年春『格致古微』成書後，章太炎的老師俞樾（1821～1907）親為該書題名並作序，鼓吹“西法之新奇可喜者，無一不在吾儒包孕之中……士苟通經學古，心知其意，神而明之，則雖駕而上之不難。此可為震矜西法者告，亦可為鄙夷西法者進也”。^⑥到俞樾、王仁俊這裡，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西學中源論運用中西雙方知識資源的廣度與深度均大幅拓展，其兩面性也在維新運動迎來高潮的歷史關頭充分顯露：此論既可為學習西方的改革訴求張目，又可為固守中國政教舊軌（包括以四部分類法為標誌的知識系統與現實政治體制）提供口實。與求變的薛福成、康有為不同，俞樾、王仁俊的西學中源論現實取向更趨保守，這從俞樾次年所作『詁經精舍八集序』以“孟子法先王”與“荀子法後王”分別比喻“矻矻焉抱遺經而究始終”與“爭言西學”二途，並自命為“孟氏之徒”的議論即可窺其底裡。^⑦對於這種態度，尊荀子、法後王的章太炎大概不會十分欣賞；但王仁俊與俞樾師徒的交往，仍然構成『膏蘭室札記』西學條目賴以產生的現實語境。

從上述情形看來，早年章太炎對西洋格致之學的接受，乃至『膏蘭室札記』西學條目的寫作，皆與西學中源論的影響密不可分。遺憾的是，這個簡單的事實迄今尚未引起思想史研究的充分重視。^⑧原因或許在於，經過從晚清到五四之間眾多思想家的批判，^⑨西學中源論對中西知識的盲目比附及其背後的文化自戀心理已被充分揭露；而章太炎作為“向西方尋找真理”的革命先覺，自不宜被劃作王仁俊之流同調。只是這種“進步”與“落後”的二分法，不僅簡化了章太炎，也妨礙了對西學中源論的深入反思。西學中源論者效法漢晉間道士造作的“老子化胡”神話，將西方知識斷定為中國學術的支與流裔，此一敘事體系在發生學意義上的確可謂無稽之談。但與此同時，他們對中西知識源流關係的討論，實際預先判定了中國與西方學術思想存在融通的空間；拋開浮在表層的發生學論斷，西學中源論指出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可能性問題，絕非全無討論價值。^⑩『格致古微』卷末附有一張大表，將西洋學術分為二十一科，與中國經史

- ① 參見章太炎1897年4月20日致譚獻書，『章太炎全集』（十二），第13～14頁；『孫寶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5），童楊校訂，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三月十四日（1897年4月15日）條。
- ② 參見章太炎：「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章太炎全集』（十），第11頁。此文原刊於『時務報』1897-3-3。
- ③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這裡指出康有為孔教論對章太炎產生過影響，並不等於認為章太炎的議論完全就是康說的複製。事實上康有為也絕非當時惟一的孔教論者。譬如章太炎交誼甚深的浙江同鄉宋恕（1862～1910），同樣對康有為不懷好感，却早在1892年便提出依“西國七日一禮拜之法”尊隆儒教，化民成俗，參見『六字課齋卑議』初稿，『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胡珠生編，第36頁。可知借鑒基督教改造儒教在相當程度上已成為那個時代知識群體的共識。
- ④ “國粹論者有三派：……第三派以為[歐]洲人之學，吾中國皆有之，『格致古微』時代之老維新黨無論矣。”陳獨秀：「隨感錄」，『新青年』4（1918）：342。
- ⑤ 章士釗：「疏『黃帝魂』」，『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第258頁。
- ⑥ 俞樾：「格致古微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4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第53頁。
- ⑦ 『俞樾全集』第14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趙一生主編，第1017頁。
- ⑧ 淺見所及，引言所述關於『膏蘭室札記』西學條目的研究中，惟有何剛剛的論文正面提到了章氏少作的西學中源傾向。
- ⑨ 晚清時對西學中源論較全面的批判可舉嚴復（1854～1921）「救亡決論」為代表，參見『嚴復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王棊主編，第52頁。五四時代的批判，除前引陳獨秀，另可舉錢玄同（1887～1939）為代表，後者直斥西學中源論為“瞎七搭八的附會”，“不但可笑，而且無恥”（「隨感錄」，『新青年』2（1919）：216），此亦一時名論。
- ⑩ 西學中源論之建立實以中西相通之可能為邏輯前提，近年來已有學者對此予以發覆，並對西學中源論的思想史意義作出更為全面而深刻的評價。參見李欣然：「中西異同視角下的“西學中源”說——兼論晚清“『格致古微』時代”的思想光譜」，『文史哲』4（2020）：116-128、167-168。

子集之四部分類法作為兩條坐標軸縱橫相峙。與人們印象中強相皮傳的立論邏輯不同，這種做法事實上是在承認中西學術各有本末的基礎上，用中國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方法理解西學之統紀。可見西學中源論對中西思想融通空間的探索，不僅發生在具體知識內容的微觀層面，並且涉及中西兩大知識系統之宏觀“格義”；而在世界各知識體系間架設對話橋樑，時至今日仍有待繼續努力。

惟其如此，章太炎從上一代西學中源論者那裡接過的，便不只是散碎的新奇詮解，更包括會通中西知識結構的沉重問題意識，這正是理解太炎西學詮釋變遷史的關鍵所在。

三 知性主體與中西冥契

『膏蘭室札記』西學條目雖屬西學中源論的延伸，但也蘊含著章太炎對西學中源論的超越企圖。要說明這一點，必須對這些條目的誕生背景稍作考察。

『膏蘭室札記』西學條目可以分為兩組。第一組為卷二內第248、338、346則，創作時間在1892~1893年間，引述的西學知識來自明末至清中前期的來華傳教士與魏源（1794~1857）的『海國圖志』；^①第二組為卷三內第411~425、427~433、462則，其中第412則「歷物疏證」、第413則「附辯者與惠施相應光學三條」專論『莊子·天下』所記惠施歷物之意，其他乃以『淮南子』『管子』『論衡』諸書為詮釋對象。後一組條目不僅篇幅大，且對廣學會、江南製造局所印西學新著旁徵博引，是『札記』西學條目的真正重心，然其創作時間在既往研究中尚未被確切指認。1896年舊曆六七月間，章太炎致函俞樾云：

吳中近設中西學堂，能以母制子否？舉世談西學者，無阮儀徵、魏邵陽之識，吾道孤矣。漆室悲時，端憂多暇，復取周秦諸子籠罩西書，除張力臣『瀛海篇』所疏，又得二十許條，匏瓜徒懸，無裨宙合。聊以張漢赤幟，亦俟秋日呈之。^②

同年8月18日（舊曆七月十日）致譚獻（1832~1901）書又提到：

麟前論『管子』『淮南』諸篇，近引西書，旁傳諸子，未審大楚人士以僞父目之否？頃覽嚴周『天下』篇，得惠施諸辯論，既題以歷物之意，歷實訓算，傳以西學，正如閉門造車，不得合微。分曹疏證，得十許條，較前說為簡明確鑿矣。^③

兩段引文中分別提到的“取周秦諸子籠罩西書”所得“二十許條”與詮釋“惠施諸辯論”的“十許條”，無論在主題、書目上，還是在條目數字上，^④皆與『膏蘭室札記』卷三西學條目若合符契，可知兩封信正是反映這些條目問世經歷的一手史料。由此可以澄清兩項重要史實：其一，『膏蘭室札記』卷三的絕大多數西學條目作於1896年舊曆六七月間。這意味著章門弟子、『札記』點校者沈延國（1914~1985）先生關於該書撰寫於1891~1893年間的判斷未盡準確；有學者以沈說為據修正章太炎本人關於早年西學接受史的敘述，很可能也需要再作商榷。^⑤其二，這些作於1896年舊曆六七月間的西學條目是先後分兩批完成的。首先寫成的是第411、414~425、427~433等則，除第414則偶及『莊子』外，這些條目以『淮南子』『管子』為詮釋對象，所引

① 參見『章太炎全集』（一），第125、162、166~167頁。「膏蘭室札記校點後記」提及，太炎長子章導（1917~?）所藏『札記』第二卷首有太炎自署“時壬辰夏至梅叔署於膏蘭室”十二字；卷二第248則以下，太炎自注云：“以下癸巳十月下旬記。”（『章太炎全集』（一），第265~266頁）由此推斷，『札記』第248則約作於1892年壬辰至1893年癸巳秋季以前，第338則、346則作於1893年秋冬間。

② 『章太炎全集』（十二），第5頁。前文有言：“甫於六月初旬，校杜氏『通典』畢……今秋杖履南來，當呈幟正。”據此推斷此信作於當年舊曆六、七月之交。

③ 『章太炎全集』（十二），第12~13頁。

④ 『膏蘭室札記』卷三第412則「歷物疏證」、第413則「附辯者與惠施相應光學三條」內細目共14條；除此二則外，卷三據『淮南子』『管子』論格致的札記共有20則。

⑤ 沈延國先生謂：“『札記』為辛卯、壬辰、癸巳諸歲札錄者也。”“引西學以釋『管子』『淮南』諸條，皆存於『札記』卷三，癸巳年之作也……由此可知，先生於一八九三年，在詒經精舍時，已治西學。”（『章太炎全集』（一），第266、270頁）其後湯志鈞（1924~2023）、熊月之等學者皆引沈說質疑章太炎本人1906年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所謂“自從甲午以後，略看東西各國的書籍，才有學理收拾進來”的自述，參見湯志鈞：『章太炎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第15~16頁；熊月之：「早年章太炎與西方格致之學」，『海派映照下的江南人物』，第32頁。然而章太炎所言，與『札記』中多數西學條目作於1896年的情況是吻合的。斯彥莉認為『札記』“撰述大致時間為1888年至1896年”（『章太炎『膏蘭室札記』重考——根據新發現的『膏蘭室札記』佚文』，『杭州師範大學學報』2（2021）：69），其說可從。

西學遍及化學、地質學、熱學、電學、天文學、生物學、聲學諸科；第412則「歷物疏證」、第413則「附辯者與惠施相應光學三條」完成於其後，詮釋對象集中於『莊子·天下』記載的惠施歷物學說，所引格致知識也由聲光化電諸科轉而集中於算學與幾何。「歷物疏證·小引」開篇有言：

算術積世愈精，然歐几里生周末，『幾何原本』遂為百世學者所宗，是算理固備於二千年前矣。中國惠施與歐几里時代相先後，其說見於『莊子』者，人第以名家繳繞（親）[視]之，不知其言算術，早與幾何之理相符。間及致用，亦自算出。^①

下文第1條釋“歷物之意曰”又云：

歷物之意，即算物之意也。僅言其意，則與幾何僅言其理者同，其致用者尚少也。^②

以算術、幾何為破解惠施歷物學說之關鍵，與前引致譚獻書所謂“歷實訓算”吻合。而致譚獻書對這一發現的自詡，表明在章太炎心目中，後出的「歷物疏證」較諸前作可謂轉進，標誌其格致之學登上了新臺階。

此一轉進的發生原因是複雜的。從相對外緣性的角度來看，『札記』卷三西學條目的寫作正值王仁俊『格致古微』出版後不久，以聲光化電等具體科學知識比附古籍的種種觀點，已由王著集其大成。繼續固守“近引西書，旁傳諸子”的老路，決難跳出王仁俊的籠罩；事實上現存『札記』中的部分西學條目，已經存在與王著暗合的現象。^③此等情形當非太炎所樂見，因此他捨棄“致用”層面的具體科學，專攻作為其根本之“理”的算術與幾何，以求後出轉精。而以算學為釐清西學本末體用之管籥，實乃涵泳於19世紀西學中源思潮的內在線索。早在1861年成書的那篇備受湘淮系洋務首領推崇、又在戊戌時期被變法派冷飯重炒的『校邠廬抗議』中，馮桂芬（1809~1874）便已有過“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的提法；^④只不過由於馮氏強調“經濟”實效性，這一表述淹沒在五花八門的“采西學議”中，並不十分突出。到了更關心“學問”自身理路的王仁俊等人那裡，此觀點的綱領性意義就格外明顯了。在『格致古微』卷六那張全面枚舉中西學術體系交叉點的長表末尾，王仁俊寫道：“以算學握諸門之紐，以化學通諸家之驛。於是博學以知服，則曰政俗；師敵之所長，則曰自強。”^⑤該書卷四又論『莊子·天下』云：

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案：此與西算相通。據上文，歷物之意似惠施所著之書。^⑥

將這些文字與「歷物疏證」對讀，不難發現章太炎專舉算理為綱，實可視為1861年以來洋務運動之西學融攝思潮的發展與延續。

然而章太炎與他的前輩們仍有一處重要差別。王仁俊稱歷物“與西算相通”，而「歷物疏證」言算術算理時絕不以“西”字冠諸其前。不寧惟是，在前揭致譚獻書中，章太炎強調「歷物疏證」的獨得之處，在於“歷實訓算，傳以西學，正如閉門造車，不得合徹”，分明以算術與西學為相對待之二事。對王仁俊等前輩論者來說，算學僅在在西學系統內是“本”或“體”，此

① 『章太炎全集』（一），第210頁。“（親）[視]”據文意校改。

② 『章太炎全集』（一），第210頁。

③ 例如『膏蘭室札記』卷二第346則認為，西方人對地球為橢球的認識，及對地球長短徑比例的測算，皆由『管子·地數』篇“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等語為先導（『章太炎全集』（一），第166~167頁）；『格致古微』卷三疏解『管子·地數』的同段文字，得出了和『札記』346則完全相同的結論（『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45冊，第92頁）。不同的是，章太炎援引蔣友仁（P. Michael Benoist, 1715~1774）與魏源，王仁俊則坦承其說有取於葉瀚（1861~1936）；雙方知識淵源及論證過程明顯相異，因此不存在互相抄襲的嫌疑。然而即此可見，隨著西學流行，章太炎在1893年矜為創獲的發現，轉眼便淪為盡人皆知的俗說，這或許對他構成相當程度的刺激。另如針對『莊子·天下』“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王仁俊與章太炎皆以地圓說解釋，惟『格致古微』謂地球為扁橢球，故中央點既可以在北極，也可以在赤道（『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45冊，第120頁）；「歷物疏證」第10條則謂地球的真正中央在球心，非人所能至，而地面之中心皆非真中心（『章太炎全集』（一），第212頁）。這種論證方式，很容易使人感到章太炎是在故意與王仁俊求異。

④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北京：朝華出版社，2017），第56頁。

⑤ 『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45冊，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第148頁。此外林頤山（1847~1907）為『格致古微』所作序言對梳理西學自身之體用的理論意圖有更清晰表達：“間嘗涉獵西書，揆其大旨，算學為經，重學化學為緯，天學、機學、隸重學，地學、礦學、隸化學，水學、氣學、熱學、電學及火器、水師等學又兼隸重學、化學。外此若聲學、光學乃氣學、熱學之分支，似非重學、化學所可隸者。”（第53頁）可知王仁俊輩以“格致之學”輔成“五帝三王治平之道”的保守政見，並不代表他們惟知“以牛為體，以馬為用”（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嚴復集』第3冊，王叔主編，第558~559頁）。

⑥ 『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45冊，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第120頁。

“本”或“體”可以在“用”的層面被中國知識系統接納，並應用於自強運動；但在章太炎看來，無論在中學還是西學框架內，算學都具有原理性意義，是“致用”的各具體學科所由出。算學的地位由此進一步抬升，並成為章太炎重審中西會通問題的基點。1897年夏，太炎討論如何“合中西之言”以化民時寫道：

往者梅定九、戴東原、阮文達之徒，常以算學通中外，故二百年以來，雖極黨同妒真之士，無以西算為詬厲者。自『瀛海論』作，而又知聲光電化之學，其原亦具於周、秦諸書也，其過者以為歐人之藝，皆祖禰亞洲，比於伯宗之攘善，斯稍稍誇謙矣。人之智慧，無東西朔南一也，鼓宮宮動，鼓角角應，閉門而造車，出則軌合，以為相應相合則可矣，以為人之長技皆出於我，則適以助學者之虛僞自滿也。^①

1899年發表的「東方格致」篇首亦云：

輓近說者或謂泰西格致之學皆出東方，蓋自張自牧『瀛海論』勅之。彼於希臘、巴比倫之說未嘗目睹，而以此張大其詞，矯誣實甚。且所引『亢倉子』等，半屬偽書，不足以為左證。余以閉門造車，出則合轍，見有冥符，而學非親授。^②

通過用算學兼通中西來取代對聲光化電諸西學的比附，章太炎既批評“人之長技皆出於我”的過當之論，同時捍衛西學中源論對“人之智慧”“相應相合”、“見有冥符”的肯定，可見他超越舊有西學中源話語系統的意圖。

不過，章太炎立論的依據，不外對“歷物之意”的文本闡釋，以及對梅文鼎（1633～1721）、戴震（1724～1777）、阮元（1764～1849）等中國學者算學成就的徵引，在論證路徑上與王仁俊仍無根本差別。是以現代讀者似乎仍有權利提出如下質疑：「歷物疏證」對惠施與歐几里得的比較，是否依舊流於文字附會？要回應此一質疑，還須對算學知識之性質作一說明。與有待於實驗的物理、化學諸科不同，包括算術或幾何在內的數學知識，其內容可以完全無涉於現象界中的感性物；如以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哲學概念表而出之，數學知識是“先天綜合”的，它們賴以成立的主觀條件，是時間與空間這一組感性直觀的純形式。^③以此“純粹理性”亦即人類普遍共具之先驗認識結構為前提，算術與幾何知識在中西文明之間的通約性，乃可於理論上獲得圓滿解釋。

“先天綜合”之類術語當然不可能在章太炎1890年代的著作中明文出現，但太炎學思進路與康德哲學的合轍之處亦不應忽視。如所周知，1906年以後，章太炎以大乘唯識學為框架构建齊物哲學體系，吸納最多的德國古典哲學家之一便是康德。『齊物論釋』破時空法執、樹時由心生之義，且以藏識中六大種子對應西方哲學“原型觀念”並統攝康德的知性十二範疇，皆與太炎早年借數學知識堅持中西間超經驗會通處在同一理路上。^④此外更具說服力的思想內證是章太炎對『大學』“格物”的訓釋。『膏蘭室札記』第441則「格物說」接受鄭玄（127～200）以“來事”訓“格物”的觀點，並以宋翔鳳（1779～1860）『大學古義說』“格物者，誠、正、修、齊、治、平之效驗也”為基礎，認為“誠、正、修、齊、治、平，皆自致知始，格物非六者之效，乃致知之效”，實即將『大學』八條目之工夫論根本聚焦於致知一點。章太炎進而用『荀

① 章太炎：「變法箴言」，『章太炎全集』（十），第22頁。

② 章太炎：「東方格致」，『臺灣日日新報』1899-04-06。

③ [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鄧曉芒譯，楊祖陶校，第32頁。

④ 章太炎：『齊物論釋』初本第1章第1節、第3節。『齊物論釋』定本改六大種子為七大種子，此不具辨。參見孟琢：『齊物論釋疏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第65～72、99～106頁。楊向奎（1910～2000）先生也曾指出章太炎以原型觀念理解數學的先驗論立場，儘管這種指點是在批判唯心主義的前提下作出的，參見「論章太炎的哲學思想」，『繡經室學術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89），第71～72頁。另可參見唐文權、羅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第172～188頁。有學者指出，科學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發揮影響，重點往往不在具體科學結論，而在從科學中抽引出的普遍方法論，呈現出“技進於道”的價值升格效應，參見高瑞泉：『中國的現代性觀念譜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第273～275頁。章太炎看重數學知識的思維典範性，與那個時代整體思潮是一致的。而由此亦可看出，將康有為與章太炎分別視作“文明單元論”與“文化多元論”之代表的常見觀察視角，似未揭示出以數學為普遍性思維模型實為康、章二人共有的思想傾向。相關討論，或需在疏解章太炎的知識論與其歷史文化觀念之關係的基礎上，方能更進一步。

子』的“解蔽”觀念詮釋致知：

“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是則不蔽者，於萬物之異，莫不豁然無疑。此即致知明矣。鄭君之義，遠本古大儒，豈後儒淺說所能撼耶？此即下文言物格而後知至者。何也？曰：致知者用其力，知至者其成功，物若不來，孰明其知之至與不至哉！……若今之所謂格物，則古人以致知二字括之而已足矣。^①

在專注於德性之知的傳統學術那裡，發揚聞見之知亦即外部知識的訴求常被斥為“逐物”，但這一批評對章太炎未必適用。章太炎的格物並非從經驗之物出發，而是以致知為起點；當作為認知主體的分別心達致解蔽之境，以差別相顯現的紛繁萬物才會如實地向主體顯現，此即“物”之“來”，亦即致知之效驗。而章太炎所謂“於萬物之異莫不豁然無疑”的知體，實即荀子所謂“虛壹而靜”以執萬物“統類”的心體：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②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遍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③

早年章太炎每曰“尊荀”，學界於此多由隆禮義、法後王等社會政治思想角度解讀，而太炎於心性義理精微處對荀學的紹續同樣值得重視。有學者指出，荀子對不同事物“兼知”，既非“返本內求”，亦非一味馳逐外物，“而是試圖從學理上打通事物的邊界，這種打通的過程其實也就是在遵守宇宙統體的大框架之下，能够辨章學術，在這個意義上，荀子的工作和『莊子·天下』『七略』在實質上是相同的”；^④明乎此便不難理解，章太炎的格物致知論與他遠紹劉向（前77～前6）、劉歆（前50～23）父子、兼祧章學誠（1738～1801）的學術史意識，也是一脈相承的。^⑤與荀學類似，章太炎的致知論，基本傾向是以知統物、以能攝所，用功於認知主體自身之建構，這與康德將知識符合於對象的舊傳統，顛覆為感官對象依照直觀能力的“哥白尼式革命”，亦不無遙契。

在今人眼中，“格致”二字指代西方科學不過是約定俗成的舊說，但對章太炎那一代舊學邃密的學者來說，“格致”卻不只是個符號。因為『大學』格物致知諸條，正是儒學對心物關係最具結構性的經典解說，也是古人討論認識論問題通用的經學語言；「格物說」明言“今之所謂格物，則古人以致知二字括之而已足”，更證明章太炎以知統物的認識論，與他由聲光化電諸科上溯算理的科學知識認知，其間存在一貫的理論思路。『膏蘭室札記』西學條目的思想史意義可以由此得到辨認：在西潮湧來的晚清時代，章太炎沒有滿足於對具體科學知識的搬運與銜接，而是將目光轉向自身，著意建立一個足以為具體科學之成立提供依據的知性認知主體，此一轉向標誌著知性思維在近代中國的深度自覺；相應地，中西思想的會通，也由發生學意義上的輾轉授受，變為知性主體的冥契，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西學中源論的揚棄。

① 『章太炎全集』（一），第241～242頁，標點稍有調整，引號內文字出於『荀子·解蔽』。除此篇外，章太炎解說『大學』八條目的文字，另有「致知格物正義」（1925）與『荀漢昌言』相關條目。晚年章太炎受王學影響日深，在工夫論上以誠意慎獨為本，更加貶低“尋求物理”的價值；至於偏重心知而非外物的基本取向，與早年並不少異。參見『太炎文錄續編』，『章太炎全集』（九），第48～49頁；『荀漢昌言』，『章太炎全集』（七），第119～120頁。

②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第395～397頁。

③ 王先謙：『荀子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第406～407頁。

④ 參鄧秉元：「早期儒家的名辯思想——孔子與荀子之間」，《新經學》第五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第55～56、60頁。

⑤ 關於章太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史意識，林少陽「章太炎的學術史著述及其與章學誠的關聯」（『中國歷史研究院集刊』（1）2022：126-206）一文已有系統梳理，可參。

四 從「東方格致」看章太炎的西學應對困境

需要指出的是，章太炎早年思想中的知性主體意識自覺及其對西學中源論的超越，是有其限度的。知性主體自覺固不失為有科學哲學意義的理論反思，但科學哲學的長遠發展終需發達的科學研究為後盾，這正是19世紀中國知識界的軟肋。章太炎雖然提出專以算理建構中西學術普遍適用的思維圖式，但「歷物疏證」與後來改定的「東方格致」仍不免時時乞靈於聲光化電等各門西學，甚至重又將西學與算理雜糅為一，^①就是因為貧乏的科學知識儲備尚不足以支持他徹底自踐其說。復次，東方格致論本以疏通中西為職志，這一工作需要全面且深刻地理解中西雙方學術。而19世紀末的章太炎既未充分認識到知性思維及其運用只是西方文化的部分面向，也沒有深入反思知性思維是否能夠解析由天人性命等基本問題展開的中國傳統學術。同時，隨近代科學興起的科學主義亦對中國知識界影響甚深。科學主義思潮將科學提升為衡量一切的價值標準，這既意味著近代西方科學對於其他知識系統或學說派系的絕對強勢地位，也導致經由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一系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提倡，並在近代科學中大放異彩的實驗方法應用日益泛化。^②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認為，無論科學主義強調的經驗實證（“知與物的符合”）還是康德哲學堅持的對象符合認知主體（“物與知的符合”），皆可歸類為流俗的符合論真理觀。^③然而，就外物與心知孰為標準一點而論，康德哲學與科學主義取徑仍可謂南轅北轍。早年章太炎謂“內典所言，自格致家出而皆微實”，^④又嘗指摘『楞嚴經』“不合物理學”，^⑤此類表述反映了以經驗實證為真理標準的科學話語霸權，而這與章太炎由致知而解蔽的思路實相扞格。太炎受科學主義侵染而不自知，也說明他當時知性主體建構尚未圓成。^⑥

尤其重要的是，知性自覺雖屬19世紀中西知識系統互動的產物，但這種知識系統互動，又無時不與西力衝擊相伴隨。比起建立知性主體的純粹理論意圖，現實危機感對當時知識分子的刺激或許尤為迫切。知性思維在理論上固然可以“無東西朔南一也”，但它在西方的快速發育所召喚出的支配與改造自然的驚人力量，及其給科技相對落後的中國造成的壓迫感，實在遠非一句“算理固備於二千年前”所能輕易抹平。在科技進步的線性坐標軸上，包括章太炎在內的西學中源論者努力通過中國典籍“建構西方科學和知識的原始文本”，^⑦在張揚民族自信的同時，也未嘗不可以被認為是從反面證明了中國文化只是西方文化過往形態的活化石，理應被後來居上的近代西方知識體系覆蓋。於是我們看到，在『膏蘭室札記』中，章太炎既高談東方古哲與歐几里得“見有冥符”，又自相矛盾地懷疑自己立說的合理性：

近人喜以佛書證明算術格致，然即如『楞嚴經』所云：積微成一阿耨，以上皆七七變之。一切塵土蟻虱，皆能分其巨細。是亦頗可通於西人微積之術。……然使今算學家引用是義，究於微積術何所發明耶？蓋其目相類，而其義之深淺不同。引之者但可取以

① 「歷物疏證」第2條將歐氏幾何的均質空間觀與無理數及原子論相提並論；第4、5、7、8、10條牽涉地圓說；附錄辯者與惠施相應於光學諸事，亦屬物理學而非算理（『章太炎全集』（一），第210~214頁）。「東方格致」的母本既包括「歷物疏證」，也包括『札記』卷三中泛論『淮南子』所蘊“物理”的那些條目。

② 相關討論參見高瑞泉：『中國的現代性觀念譜系』，第279~281頁；另參余英時（1930~2021）所論“知性的傲慢”，「錢穆與新儒家」，『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1991），第93~94頁。

③ [德]海德格爾：『論真理的本質』，『路標』（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孫周興譯，第208頁。

④ 『孫寶瑄日記』，童楊校訂，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三月初二日條，第203~204頁。

⑤ 章太炎：「摘楞嚴經不合物理學二條」，『臺灣日日新報』1899-02-19。

⑥ 大體上看，章太炎對科學主義之經驗實證傾向的克服，是在齊物哲學系統內通過徹底轉向唯心論的方式完成的。不過，中年章太炎有時仍稱佛法為“哲學之實證者”，而不詳辨“直觀自得”的“聖智內證”與現象界的經驗實證並非一事，仍可見科學主義的殘存色彩。黃嘉慶認為，章太炎對西學知識的理解存在感官化傾向，“這些知識從一開始就與感官聯繫在一起……所有的知識都需要感官證據的檢驗”（「章太炎早期札記中的“西學”問題」，『現代中文學刊』2（2022）：62）。這一觀察對於揭示科學主義的干擾是有見地的，但相對於歸本心知的格物論，感官化絕非章太炎知識論的根本特徵。

⑦ [德]朗必樹（Michael Lackner）：「知識源於東方？——再議西學中源說」，『朗必樹漢學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徐艷主編，第18~31頁。

考古，如埃及碑之類，而於闡明算術終無與也。^①

說東方古書的算術格致“如埃及碑之類”僅餘考古意義，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關於儒學在20世紀業已死去並淪為“博物館的歷史收藏物”的著名論斷。^②在西方文明擅其勝場的知性之學中尋求中西知識的共通本體，反而導致中國學術現實活力之喪失及價值之消解，這是籠罩太炎早年學術的一大根本困惑。中西學術的源頭活水尚未疏浚，保種保教的時代使命卻已迫在眉睫；在思想與環境的雙重重壓下，潛伏於西學中源論的虛驕優越感就很容易捲土重來。這便是章太炎發表「東方格致」的心理背景。

1898年冬，章太炎因戊戌黨禍避地臺北，在『臺灣日日新報』辦理筆政。次年春，他將『膏蘭室札記』卷三中討論惠施算理及光學的第412、413則，和討論『淮南子』“精研物理之語”的第415~424則，以及據『管子·侈靡』論大氣環流的第427則予以重訂，以「東方格致」為總題，於1899年4月6日至4月25日之間分13節連載於『臺灣日日新報』。^③學界素知「東方格致」與『札記』的文本承繼關係，但較少對二者的差異作深入挖掘。實則「東方格致」對母本的改寫，頗可揭示章太炎因應西學挑戰的隱微心跡。

首先，「東方格致」的修訂，反映出1896至1899年間章太炎西學知識的更新。一個顯例是「東方格致」新出現的“散點”概念。『札記』第415則以化學釋『淮南子·俶真訓』云：“化學積六十餘原質所作，然原質又係何物，格致家即謂若干阿屯。”^④此即道爾頓原子論基本內容。而在「東方格致」中，對應的文字被改為：“原質六十餘種，由散點所成，而此點未散之先果為何物，則有阿屯之說。”^⑤元素與原子之間，憑空插入“散點”二字，令人莫名其妙。1898年章太炎與曾廣銓（1871~1940）合譯『斯賓塞爾文集』，首編『論進境之理』云：“姑以為權輿太始之時，太陽與各星質皆為散點，因歛而成積。”覆按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原文可知，此段內容所談乃原始物質微粒由於引力作用而聚合為太陽系諸星體，源出康德—拉普拉斯星雲說，則所謂“散點”即“星雲”別名。以今人之科學觀念看，天體物理學的星雲，與科學原子論的微觀粒子，顯非同一層面概念；「東方格致」將“散點”孱入元素和原子之間，是誤將不同學說混為一談了。但這個“錯誤”，也恰可表明章太炎急欲將新近接受的星雲假說納入科學原子論提供的宇宙圖景，用“其小無內”、不可分割的單質化粒子，一以貫之地解釋包括宏觀與微觀在內的整個世界。

另一顯例則是進化論的引入。『札記』第412則第5條解釋“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本以地球自轉導致晨昏分界立說，「東方格致」則在原文後加入一段議論：“金石動植，無時不有進步，即無時不有變種。扯拉草子之形，今昔（迴）[迴]異，何但朝菌日及哉！故曰物方生方死也。”^⑥章太炎已不再滿足於討論無意義的物質變動，而是徑將“進步”觀念點明，並認定為無機界與有機界共同遵循的鐵律。另如『札記』第421則釋『淮南子·墜形訓』“突生海人”至“肖形而蕃”一段，援引西方地質學家對古生物化石的挖掘，得出“物性古今不變”的結論；^⑦「東方格致」相應段落乾脆將舊作推倒重寫，開篇即言：“人類之初，本是猴猩，歷數千年而改良，

① 章太炎：「漢人用佛經語」，『膏蘭室札記』第454則，『章太炎全集』（一），第253頁。

② [美]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鄭大華、任青譯，第337~338頁。

③ 「東方格致」在『臺灣日日新報』分13次連載的具體日期，分別是4月6日、4月7日、4月8日、4月9日、4月11日、4月12日、4月13日、4月14日、4月15日、4月16日、4月20日、4月21日、4月25日。包括「東方格致」在內的章太炎旅臺時期論文，曾在王仲榮先生主編的『歷史論叢』第4輯（濟南：齊魯書社，1983）刊佈，但因漏收4月9日連載的段落，導致此後數篇發表時間頗有錯繫，文字也稍存訛誤。其後彭春凌『儒學轉型與文化新命：以康有為、章太炎為中心（1898~192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對章太炎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刊發的詩文重予匯總，糾正了此前整理者對「東方格致」的誤繫。

④ 『章太炎全集』（一），第215頁。

⑤ 章太炎：「東方格致」，『臺灣日日新報』1899-04-09，第5版。按「東方格致」下文詮釋『淮南子』，也有兩處提到散點：“蓋自太虛散點積為火球，屢次崩裂，乃成今之形體”；“地球初成，散點始聚，雜亂無章”，見『臺灣日日新報』1899-04-13，第3版；1899-04-21，第3版。

⑥ 章太炎：「東方格致」，『臺灣日日新報』1899-04-07，第3版。“扯拉草子”乃古植物種子化石。

⑦ 『章太炎全集』（一），第220~221頁。

子·天文訓』“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但謂西漢以前中國人即有化學知識而已，「東方格致」則將此段末後數語改寫，謂“原質之名，古必完全無缺”，^①即中國人在兩千餘年前便已完整掌握元素週期表。面對晚明時代耶穌會士帶來的科學知識，徐光啟（1562～1633）曾提出“會通以求超勝”，^②主張譯介西書以求後來居上，用梁啟超（1873～1929）的話說，乃“有俟於後起”；^③章太炎的東方格致論雖承其餘緒，卻是轉向遙遠的過去，指望倚賴“東方古儒”的高見維護民族自尊，乃至流於阿Q式文化自信。然而如前所述，章太炎本人在理智層面已認識到簡單比附中國古籍與西來知識的虛妄。職是之故，他還試圖以前人成說為基礎，繼續發揮獨創性的格致新知。『淮南子·覽冥訓』云：“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札記』第423則嘗以地殼及生物圈由來釋之，「東方格致」不復討論生物圈知識，而專談地球形成史，其言曰：

（地球）第有兩極，無四極之名。而此言四極者，地球初成，散點始聚，雜亂無章，其轉動亦非能一律，內軌道二行星攝力雖微，外軌道五行星則攝力甚大，故其動未必僅斜倚二十三度也。夫如是，則南北亦不能永靜，而四方皆可稱為極矣。攝力既大，則旋轉不能自主，如痿廢然，故曰“四極廢”也。^④

據此說，『淮南子』所謂“四極廢”描述的是地球初由宇宙塵埃積成之時，自轉軌道與週期由於其他行星吸引而不能固定的混亂景象。其說不見於『談天』『格致探原』諸書，應是太炎受星雲學說啟發產生的新見。這種觀點無法由實際觀測佐證，也沒有解釋黃赤交角如何從“四極廢”的無序狀態中趨向穩定；不過即使在今日的天文學界，星雲理論仍屬假說，且太陽系角動量問題也未獲徹底解決，則章太炎自我作故的新解仍不失為一家之言。個中緊要之處在於，太炎已不滿足於“以泰西新義”“證明”中國古籍，他正在嘗試跳出“照著講”的老套“接著講”，在前沿科學問題上直接回應西方。比起重彈西學中源論的老調，這種另闢新境的學術勇氣，確實難能可貴。只是無論“接著講”，還是“以泰西新義為之證明”，都是將數理化等科學知識預設為中國傳統學術中有價值的內容。表面上看，「東方格致」四字強調的是東西方差異，但在經驗世界中自然科學知識普遍有效性的映照下，承諾建立一套區別於“西方”科學的“東方”科學，實無異於臆造空中樓閣，^⑤非但無以安立“東方”，反而取消了中國文化相對於知性思維主導下的近代西方科學文化的獨立性——傳統四部體系的知識遺產，其主要價值並不反映在自然科學領域，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

由是觀之，東方格致論雖以“會通以求超勝”為發心，却走入了歧途：它既沒有讓缺乏科學訓練的章太炎成長為一名“格致家”，也沒有讓“東方”在這套話語中自立。以西方強勢科學話語為出發點的單向“會通”，儘管在具體表述上不乏以中學為本位的民族主義激情，其真正效用，却是令中國學術完全為科學主義所籠罩，進而被徹底瓦解為碎片化的素材或史料，由近代知識系科重予部勒。這正是20世紀中國學術大勢的縮影，也意味著章太炎的東方格致論走入了斷港絕潢。

五 餘論：東方格致論的思想史流響

因應西方科學挑戰是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課題。東方格致論的挫折，反映出此項課題的

① 章太炎：「東方格致」，『臺灣日日新報』1899-04-15，第3版。

② 徐光啟「曆書總目表」：“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徐光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王重民輯校，第374頁。

③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全集』第十二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湯志鈞、湯仁澤編，第600頁。

④ 章太炎：「東方格致」，『臺灣日日新報』1899-04-21，第3版。

⑤ 1907年3月6日，章太炎在『民報』第12號發表「社會通詮商兌」，中言：“社會之學，與言質學者殊科，幾何之方面，重力之形式，聲光之激射，物質之化分，驗於彼土者然，即驗於此土者亦無不然。”這種對自然科學知識普遍性的認識，正可揭示東方格致論的痼疾所在。

難點。其一，近代中國於內憂外患下醞釀的民族主義情懷，既是知識界接引近代科學的動力，又對學者直面西學的心態造成很大影響，西學中源話語的爭勝衝動即其縮影。其二，接引近代科學勢必觸及知性思維自覺，這不僅需要更為豐碩的具體科學成果為其資糧，更需要回答知性思維在中國傳統學術譜系內的安置問題，換言之，即在中國傳統知識框架下建立一套足以兼容純粹知性主體的“科學哲學”，這也是突破科學主義牢籠與“中體西用”悖論的關鍵所在。以下將由東方格致論之遺留問題為視角，就其對章太炎畢生學術變遷、特別是國粹觀念與齊物哲學框架建構等兩大關節點的影響略作發覆，以結束本文的討論。

1906年，章太炎第三次東渡日本，此後旗幟鮮明地提倡“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

為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廣義說的，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①

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②

章太炎國粹論強調的是國族歷史文化的別異性，而聯繫到章氏在20世紀前夜建構東方格致論的艱難嘗試，我們或許可以發現一個理解其國粹或國故觀念來歷的新視角。在西方科學帶來的巨大學術焦慮驅動下，章太炎苦心孤詣地辯稱古人於科學早有默會，結果反倒證明中學“但可取以考古，如埃及碑之類，而於闡明算術終無與也”；而他在1906年以後掉頭專從歷史維度的文化特殊性表彰國粹國故，則可謂將中國古書“但可取以考古”的判斷反題正做，由此截斷眾流，徹底告別東方格致論視闕內與西方科學無休止的纏鬥及其引發的思想反覆。那以後，章太炎一面高呼“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一面告誡青年“斷不可學『格致古微』的口吻，說別國的好學說，中國古來都現成有的”，^③看似與西學中源論涇渭分明，實則太炎由文明差異性視角批評王仁俊輩，也未嘗不是在自道來時心路。

無獨有偶，就在章太炎正面提出“用國粹激動種性”的前一年，清廷宣布廢科舉，倡議其事的張之洞即率先將武昌經心書院改為存古學堂；而這個學堂的新名號，與太炎所謂“說經者，所以存古，非所以適今也”^④的經學定義若合符契。當西學行將對中國原有知識系統進行更替之際，章太炎退守以歷史為本的國粹，其實代表了那個時代中國人面對知識失範的一種普遍策略。^⑤在這種策略中，證成東西之冥符的理想被暫時懸擱，中國文化的本位價值則至少得到暫時性的肯定，儘管單憑歷史維度是否足以長久地貞定一個民族的文化生命，尚屬可以討論的話題。

不過，章太炎非常明確地將別異性國粹範疇限定於歷史。儘管他有時也將先秦九流言道之學稱為國故，然諸子所見實即哲學在中國文化內的對應物，並非僅屬歷史陳跡；至於太炎自詡兼攝“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堪比“因陀帝網”的齊物哲學，^⑥更顯然接續東方格致論會通中西的宏願。時下有論者較多援引章氏著作中的別異性國粹觀念表達，甚至傾向於將其解讀為中國文明特殊性的理論支持，似未盡合於太炎著論之本願。

早年章太炎建立知性主體以回應近代科學的訴求也貫穿於1900年代後期定型的齊物哲學體系。此一體系的特點是援佛證莊，尤以法相唯識學為基礎資源。對法相宗“應機說法，於今尤適”的時代意義，章太炎有著清晰認識：“今世科學論理昌明，華嚴、天臺，將恐聽者藐藐，非法相不能引導矣”；“漢學考證，即科學之先驅，科學又法相之先驅也。蓋其語必徵實，說必

① 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演講集》（上），『章太炎全集』（十四），第8頁。

② 章太炎：「自述治學之工夫及志向」，《演講集》（下），『章太炎全集』（十五），第506頁。

③ 章太炎：「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章太炎全集》（十四），第121頁。

④ 章太炎：「與人論『樸學報』書」，《章太炎全集》（十二），第231頁。

⑤ 對此鄧秉元「新文化運動百年祭——兼論周予同與20世紀的經學史研究」一文已有揭示，參見氏著『新文化運動百年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第16～18頁。

⑥ 參見『薊漢微言』，《章太炎全集》（七），第69～70頁。

盡理，性質相同爾”。^①法相宗的縝密分析是知性思維在東方傳統學術中真正的用武之地，而太炎對唯識三性及八識次第的理解也深化了知性思維之自覺。『建立宗教論』認為，遍計所執自性“惟由意識周遍計度刻畫而成”，舉凡色空、自他、內外、能所、體用、一異、有無、生滅、斷常、來去、因果等名相分別皆依之而起，“離於意識，則不得有此差別”。^②古代唯識學經典認為第六意識與第七末那識皆有遍計所執自性，章太炎稱遍計所執性為第六意識專有，頗招佛教界非議。^③實際上，這個超出眼耳鼻舌身五識之上、專憑因果等範疇運用周遍計度刻畫功能的第六意識遍計所執自性，正是早年章太炎嘗試建立的純粹知性認識心在唯識學內的別名。依託於唯識學義理框架，章太炎找到了知性思維與東方古學接榫的契機；在萬法唯心真諦融攝下，章太炎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客觀實證導向的科學主義干擾，既得以安立知性思維，又得以繼續思考對知性思維的超越。此外，章太炎解析遍計所執自性，不僅強調它“周遍計度”的分析功能，還強調其“執著名言”，這揭示出齊物哲學的語言哲學取向。東方格致論的知性主體反思受制於自然科學成果的貧乏，而在齊物哲學系統內，章太炎另闢蹊徑地轉向基於傳統小學資源的語言哲學反思，取得了與科學哲學異曲同工的效果，這或許堪稱體現中國哲學之中國性的一個光輝典範。不過，章太炎以最契於“今世科學論理”的唯識學語言建構齊物哲學，意味著他對真諦的理解，乃以知性分析為上達之徑，這與傳統儒、道等學派“先立其大”地徑以證悟本體為第一命題尚有微異；民初“回真向俗”的章太炎雖提出“以莊證孔”，但此後的哲思在發明真理的高度上皆未超出『齊物論釋』，可見如何使聞見之知上契於德性之知、構建德知一體性更為圓融的義理架構，並理解宋明以降日趨成熟的儒釋互構文化格局，仍是齊物哲學的未竟之業。此則有待於熊十力（1885～1968）對性智與量智的討論、牟宗三（1909～1995）“良知坎陷開出認識心”之命題繼起，^④在章太炎問題意識的延長線上，繼續疏通勾聯圓教系統與知性文化的思想路徑。

[責任編輯：廖媛苑]

① 章太炎：「自述學術次第」，『太炎文錄補編』（下），『章太炎全集』（十一），第495頁。

② 章太炎：「建立宗教論」，『民報』1906-12-1，第9號。

③ 『成唯識論』：“第六第七心品執我、法者是能遍計。”“唯於第六、第七心品有能遍計。”（〔唐〕玄奘譯：『成唯識論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韓廷傑校釋，第573頁）孟琢亦曾指出，章太炎對遍計所執性與依他起性的劃分，“以執持名言、專用思維為斷，辨東西方哲學之封畛，此太炎語言哲學之要義也”（『齊物論釋疏證』，第188頁），未可徑以舊說橫議。

④ 參見熊十力：『新唯識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第130～132頁；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牟宗三先生全集』（二十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3），第127～129頁。